**《苦水音乐》中的男性气质研究**

作者简介: 高珊，广西大学文学院，通讯地址: 广西南宁市西乡塘区大学东路100号广西大学西校园23栋。研究方向为外国文学。

**摘要**

布考斯基在《苦水音乐》中用大量篇幅描写了美国底层男性的生存处境，从《好一个当妈的》中的少年“我”到《大诗人》中垂垂老矣的伯纳特-斯塔奇曼，布考斯基的笔墨几乎都以男性为中心，因此带有深刻阶级烙印的男性气质是这部短篇小说集中最引人注目的特点。本文以文本分析为基础，结合相关性别理论，探讨了男性气质建构的前提、必经之路和方式，并总结了作者透过作品表达出的性别观念。

**关键词**：男性气质 性别关系 底层社会

《苦水音乐》是美国作家查尔斯-布考斯基（Charles Bukowski）出版于1983年的短篇小说集。这部作品集中反映了20世纪中后期美国底层民众的困顿生活和贫瘠的精神世界。作品中充斥着酗酒、暴力、失业、性等元素，其中性是贯穿全书的最重要的母题，作品中也呈现除了独特的男性气质。

一、男性气质建构的前提：脱离父亲掌控

布考斯基在《苦水音乐》中用诸多笔墨刻画了社会底层的父子关系，值得注意的是，《好一个当妈的》、《父亲之死Ⅰ》、《父亲之死Ⅱ》这三篇集中叙述父子关系的短篇小说被安排为《苦水音乐》的开头三篇，这可以理解为父权制是男性之所以成为男性所必须首先面对的课题。

在《好一个当妈的》中，“我”的伙伴尤金趁着另一个伙伴艾迪的母亲遭受巨大痛苦且酒醉之时猥亵了她，这一场景被“我”亲眼目睹并引起了“我”的性幻想。在“我”的幻想中，“我”征服了艾迪的母亲，在与女性的性关系中占据了支配地位。与幻想形成鲜明对照的则是事发第二天的现实生活：“我”被怒气冲冲的父亲监视着用割草机除草，父亲“看起来很火”。

布考斯基的极简主义写作手法在此达到了令人遐想的效果：父亲可能知道了“我”与尤金做的坏事，也可能并不知情，但无论如何他都可以对“我”毫无理由地呼来喝去，而“我”也不得不听命于他。有幻想作对照，现实中的“我”被父亲随意支配，更凸显出了父权的强大。由于父权制的限制，“我”只能听从父亲的命令进行劳动。文中的“我”是尚未摆脱父亲束缚的男性，此时的“我”无法拥有自己的独立人格，行为举止都是父亲强权之下的产物。

罗伯特-布莱（Robert Bly）在他的著作《上帝之肋：一部男人的文化史》中指出：“‘野人’同意归还金球，前提是男孩先把笼子打开。”布莱的“金球”象征着我们在被划分为男人与女人、穷人与富人、好人与坏人之前的“个性的统一”，“‘野人’这个形象代表的是野性或粗糙，但这里所说的野性或粗糙并不是男人们熟知并接受的那种男子汉的力量，相反，‘野人’的力量能引导男人采取强有力的行动，这种行动本身是一种决心而不是残忍。”《苦水音乐》中大多数男性仅仅具有“野性或粗糙”，而无法实现“强有力的行动”，没有形成完整健全的人格。

布莱同时指出，“钥匙在我们的妈妈的枕头下面。”他认为这与弗洛伊德从《俄狄浦斯王》中得到启发而提出的“俄狄浦斯情结”有诸多相似。结合小说作者安排的故事情节，“金球说”更与19世纪末期由“俄狄浦斯情结”引申而来的“俄狄浦斯投射”不谋而合。

“俄狄浦斯投射”概括了儿童生活的基本问题：“他是否是命运的被动的对象、他人的累赘和生活的玩偶，他是否作为他自身内部积极生命活动的中心，将以自己的力量掌握自身的命运。”《好一个当妈的》中的“我”显然并不具有这种自主性。“我”已经产生了自我意识，但是由于经济上的不独立、社会地位的不完善，“我”必须倚赖父亲才能得以正常生活。因为父亲这一角色的限制，“我”不得不压制自我意识，无权掌握自己的人生。

按照布莱和弗洛伊德的观点，不难得出结论，男性想要拥有完整的男性气质，就需要先解决“俄狄浦斯情结”这一问题。在《苦水音乐》中集中讨论父子关系的故事里，母亲这一角色均是缺席的，

父亲对儿子的支配地位一方面立足于生物学意义上的父与子的二元关系，更重要的立足点则是社会学意义上的父子关系。一对父子是否具有血缘关系是次要的，重要的是在儿子由无自我意识的婴儿逐步社会化的过程中，父亲扮演了“父亲”的角色，为儿子提供食宿等物质支持，并按照传统男权制的标准，对妻儿享有绝对拥有权。父子之间的支配与从属的格局并非与生俱来，而是经济、社会心理、家庭结构等多方面的因素共同塑造的。

社会意义上的父子之间的支配与从属地位，在大多数时候（除去父子均脱离社会隐居起来的情况）不以一方的死亡为终结。因为父与子不仅是家庭结构中的父子关系，同时也是社会关系的组成部分，社会关系的限制使得父子关系在一段时间内具有相对稳定性，父子关系随着社会关系的更迭而变化，而不随着一方生命的终结而立刻结束。在《父亲之死I》中，主人公亨利与父亲生前的女友发生性关系、抽父亲的雪茄、穿父亲的浴袍，他用这种占用父亲一切的方式宣告“父与子”的支配与从属格局的结束。在《父亲之死II》中，亨利用完全相反的方式割裂父子间的联系，他快速且不计代价地处理了父亲的遗物，与《父亲之死I》相同的是，同名主人公亨利都是在急于逃脱父权的阴影。对于“儿子”而言，“父亲”是他们与社会之间的一道隔离墙，“儿子”想要获得完整的社会人格，就必须突破“父亲”这一角色的限制，通常这种突破由“儿子”的事业进展来推动完成。然而从小说中不难发现，亨利并非事业有成之士，他过着浑浑噩噩的生活，对于亲情表现得冷漠而疏离，即使母亲葬礼当天也要去赛马场，甚至还要“打炮”。因此，他的社会属性由于处于支配地位的“父亲”这一形象的存在，始终是不完整的，而他自身也不具备突破这种限制的能力，只能被定义为“你看起来真像你父亲”。

二、男性气质建构的必经之路：与女性之间既对立又同一的关系

凯特-米利特援引马克思-韦伯在《经济与社会》中提及的观点，认为两性之间是支配与从属关系，男人有权支配女人。从生物学的角度而言，越是高级生物，雌雄体分裂的倾向就越明显，这是出于繁衍健壮后代的需要，人类作为高级动物，男性与女性的生理特征差异明显。“而人作为社会人，男性与女性之所以具有社会意义，是因为剥削关系将他们联系在一起，又将他们区分开，从概念上来讲，没有相对应的男人这一范畴，也就没有女人，就像没有奴隶主也就无从谈论奴隶一样。”《圣经-创世纪》的第三章记录了亚当和夏娃的故事，布考斯基小说中男性与女性就像其中的亚当和夏娃一样，男性与女性既是伊甸园中相异于蛇和苹果的同类，同时，女性又是男性那根被分裂出去的肋骨，是相对于男性的“第二性”。

《苦水音乐》着眼于美国下层民众的生活，主人公无论男女，大多没有稳定、体面的事业，他们的社会地位也无法满足他们的自我期待。因此，男性使用暴力、酗酒、纵欲；女性卖弄身体、酗酒、歇斯底里，他们通过这些方式放大对自身生理需求的满足，来填补社会需求无法得到满足的空虚。男性与女性在生物性需求之上、社会性需求之下相互依存，同处底层阶级的男性与女性之间存在着同情和扶持。

《如何被出版》中地下作家的妻子玛丽帮助他一起招待性格古怪的编辑麦洛克和他的妻子哈妮沙克尔，最终主人公认为他的精选诗集要被出版了。《进来，出去，结束》中的主人公切那斯基去外地参加诗歌朗诵会，在外地的大学和回程的路上的所见所闻都让他感到不适，他与社会之间似乎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但当他见到来接他回家的女友安，他感受到了自己对安的爱情，在伴侣身边时，切那斯基的感觉是“一切都很好”，事业中遇到的不如意都被恋人之间的温情所弥补。

布考斯基的作品中存在着少数温暖的男女间的关系，但除了正面的相互同情和扶持之外，作品中出现的更多的则是男女共同堕落。身处底层的男性与女性在面对空虚的生活时所采取的逃避方式也表现出了他们的同一性。《你吻了莉莉》中的中年夫妻西奥多和玛格丽特一起沉溺于对婚姻生活中污点的记忆中，两人因为感情琐事对彼此开枪，这种歇斯底里的发泄方式正是对无意义的婚姻生活的绝望反击。西奥多和玛格丽特在文中是相互对立的，然而他们恰恰是彼此在面对这段婚姻时的唯一战友，也是处于相同社会阶级和生活现状的同类。《爱电梯的男人》的主人公哈利与他在电梯里第一次艳遇的女人娜娜之间事实上就是一种以性为纽带的同类关系，他们的生活空虚无聊，通过追求性方面的刺激来排遣寂寞和压力。

无论是正面的相互扶持还是负面的共同堕落，布考斯基笔下的男性与女性之间都存在着不可忽略的共性，这种共性并非是生物意义上的性别模糊，而是指他们处于相同的社会阶级，面对相似的生活困境，有着类似的精神状态。

“在社会的下层，男性更多地是单凭自己的性别来宣称自己的权威，实际上他常常不得不与他的阶级中具有经济实力的妇女分享权力，而在中上层阶级中，男性往往不必直言男权制，因为他们享有这种地位，在任何情况下都拥有更大的权力。”在男权制社会，男性相对于女性而言具有天然的优势，男性是第一性，女性是第二性，这种情况在布考斯基笔下的社会底层阶级更是明显，“卡车司机或屠夫总可以依借自己的‘男子汉身份’，假若这最后一点虚荣心也受到侵害的话，他便可能想出更为粗暴的方法。”

在上文提及的希伯来传说中，是夏娃首先受蛇的诱惑尝了禁果，进而邀请亚当与她一起偷食禁果，从而造成二人被赶出伊甸园。这个故事情节有两层含义：第一，女性的判断力和抵御诱惑的能力都比较低下，智力方面不如男性；第二，女性要为情欲的发生负责。女性在传统的男权观念中被物化了，在与男性的性行为中，二者并非平等关系，而是由女性扮演了诱惑者，男性扮演被诱惑者的角色，女性美的唯一参照对象是男性的审美愉悦程度，女性是相对于男性的他者。

《不算是伯纳黛特》一文就具有这样的隐喻，故事中的主人公因为被伯纳黛特吸引而利用花瓶自渎，但全篇犹如一个悬疑故事一般，直到最终才揭晓，整件事完全没有伯纳黛特的任何责任，但主人公却在护士问起他生殖器受伤的原因时，首先将故事引向了伯纳黛特。在这篇故事中，女性成了诱惑男性的客体，成了男性发泄欲望的“花瓶”。在生物性的性关系方面男性与女性之间存在这种被诱惑者与诱惑者、主体与个体的不平等关系，在社会性的男女关系方面，女性也仍然是“他者”的身份。

当男性在社会生活中遭遇失败时，为了维持所谓男子汉的自尊，女性就成了最合适的发泄对象。因为从男权社会早期遗存下来的集体无意识使他们坚信即使社会价值无法得到满足，他们也可以通过对女性的支配获得尊严。《爱电梯的男人》中的男主人公哈利在电梯里与陌生女性娜娜发生性关系，当这种性关系转移到女方的家里时，这种性联系发生的重要条件——空间被割裂了，哈利无法顺利地继续与娜娜发生性关系，转而在电梯里强暴其他女性。哈利是一个随时面临失业危险的男人，因此他需要通过在电梯里强暴女性来弥补他强烈的不安全感，电梯这个密闭的空间是他逃避现实生活的堡垒，在这个堡垒里他通过性别优势实现对女性的控制，以伤害女性为代价获取男性的尊严。我们不难发现，这个故事中出现的与哈利有关的三个女性代表了男性眼中女性的两个重要分类。

1.对于前后两个与哈利在电梯里发生性关系的女性，作者对他们的外貌有详细的描写，尤其突出了其外貌中的性暗示。例如对第一位女性娜娜，作者这样写道，“她穿着黄色连衣裙，头发挽在头顶，蹩脚的珍珠耳环在长的白色耳链上晃动着。她的臀部很大，身体很丰满。她的胸部和身体仿佛要从黄色连衣裙里蹦出来。眼睛是非常淡的绿色，直直看透了他......嘴唇涂了口红。涂得很厚的嘴唇很放荡，几乎有点丑陋，像是一种侮辱。”[]与哈利在电梯里发生性关系的第二位女性是完全被迫的，作者这样描写这位受辱的远东女性，“黑头发、黑裙子、白上衣、裤袜、很小的脚、高跟鞋。她的肤色有点黑，只涂了一点口红。”[]这里充分表现出了男性眼中被物化的女性，其首要价值就是外貌对男性的性吸引力。

2.与电梯女郎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作品中关于哈利的妻子瑞秋的叙述。瑞秋的生活中只有两件重要的事情，其一是关注自己有没有怀孕，因为一旦怀孕她便需要去堕胎；其二是为哈利准备好饭菜，照顾好他的日常起居。不难发现，身为一个妻子，瑞秋的价值完全被禁锢于家庭之中，甚至她连女性基本的生育权都无法由自己掌握。正如凯特-米利特在《性政治》中所言，“女性的有限作用往往使她停留在生物经历这个层面上。几乎一切可以明确称为人类而不是动物行为（动物也同样会生育，照顾幼仔）的活动都属于男性。”

布考斯基笔下的这个故事里，女性是男性的绝对附庸，对于故事的男主人公而言，女性只分为两种，以妻子为代表的女性角色是为他们的日常生活提供支持，为他们做饭、洗衣服、打扫房间，事实上这也是满足他们生理需求的一种表现；以电梯女郎为代表的女性角色满足他们的性欲望。男性在事业上受阻时将此种压力顺理成章地输出给女性，而女性，尤其是那些经济无法独立，社会地位不高的女性，只能无奈地接受这种来自男性的负面能量，被男权社会的性政治所禁锢。

《苦水音乐》中男性与女性之间并不仅限于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而是表现出了一些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出现的新现象。

《一个头像》里的主人公玛吉因为丈夫英年早逝而沉溺酒精，她暗恋邻居的情夫、诗人雷诺夫斯基，然而当雷诺夫斯基提议与她发生性关系时，玛吉拒绝了。她是生活在空虚迷茫中的女性重新明确人生方向的正面典型。这个故事体现出了女性逐步脱离男性在性方面的支配地位，开始正视自己的内心需求，并尊重这种需求；另一方面，作为异性性关系的两个主体，男性相较于女性而言，对于性与爱相结合的要求更低。

《高飞的鸟》中知名的女诗人受到记者的敬重，就连“我”也不得不赞叹她得体，并且“我”只能想象出她站在大学讲台上的样子，却无法想象她在床上的样子。这是暗示读者，当女性拥有体面的社会地位时，在相对她而言阶级地位较低的男性眼里，她的社会属性已经战胜了生物属性。即当女性具有相对较高的社会属性时，她的经济实力所带来的阶级关系的提高，可以弥补其在男权社会中的性别劣势。也就是说，男性是无法统治社会阶级地位高于自己的女性的。

《两个吃软饭的》讲述的是女性提供金钱包养男性的故事，是传统意义上的性别倒置。妇女基于事业的成功和经济的独立，可能会与男性形成支配与被支配的格局。这证明了性别之间的支配与从属关系并非是生物性的，而是社会性的，男性在经济实力远远低于女性的情况下，可能处于被女性支配的格局。

综上，在《苦水音乐》中，一方面，男性相对女性处于支配地位，女性是帮助凸显男性气质的他者，另一方面，社会底层的男性与女性之间相互依存，面对底层的生活困境，他们又是同一的。此外，女性在具有相对较高的经济条件、社会地位的基础上，可以超越男性与女性之间传统的阶级划分。正如在第二次女性主义浪潮初期，研究两性人的心理学家罗伯特-斯托勒提出的性别与社会性别的划分方法中，将性别差异的社会文化意义从其生物学基础上区分了出来。男性与女性的支配与从属地位并不是由生理属性自然划分的，而是在社会化的过程中形成的。

相对于传统的男性，布考斯基笔下的男性气质建立在作者进步的性别观之上，即男性气质并不意味着男性完全而彻底地支配女性，男性与女性之间的支配与从属关系由各自的社会地位、经济实力、二者之间的关系等多种因素决定，被女性支配的男性同样具有布考斯基意义上的男性气质。

1. 男性气质建构的方式：脏话与酒精

布考斯基在《苦水音乐》中几乎每篇故事中都充斥着三大元素，即性、脏话与酒精。性关系在上文中已经提及，是发生在男性与女性之间的互动行为。而脏话与酒精则如布考斯基笔下的男主人公自身携带的基因一般，男性们通过说脏话与酗酒来展现自己的男性气质，借此体现自己作为男性的“勇气”。这种“勇气”也正是《苦水音乐》中的男性们希望体现出的男性气质。“勇气”一词在布考斯基的笔下有丰富的内涵。

在布考斯基的长篇小说《邮差》的中译本译后记中，译者杨敬如是写道：“有种，英语里叫 gut。口语中的gut和书面语的解释有区别。尽管我们可以泛泛理解为勇气，但不足以表达gut的含义。gut 更加情绪化，更强调男性本能。这个单词对了解布考斯基很重要。”在布考斯基眼中，gut所代表的是理想中的男性气质。

由于《苦水音乐》中的男性只有较低的社会地位，大多数是蓝领工人或者失业人员，所以他们无法通过成功的事业、社会地位或经济实力实现理想的男性气质。对于底层男性群体而言，脏话和酒精无疑是排遣这种无法凸显男性气概之焦虑的无可奈何之举。

《苦水音乐》中的男性不仅是在与他人的对话中通过脏话施加语言暴力，而且脏话本身就是他们的语言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脏话文化史》的作者露丝•韦津利认为，说脏话的好处就在于：“你可以在象征层面上使用暴力，这样既达成了目的，又避免了伤害人身体——这是一种双赢策略。”弗洛伊德认为脏话是满足了那些被压抑的攻击愿望。在布考斯基笔下，性暴力和语言暴力是底层男性发泄暴力的最重要的途径。上文提及的性暴力是男性针对女性实施的，而这里的脏话，即语言暴力，则并不指向明确的客体。在作品中，脏话既存在于男性与女性、男性之间的对话中，也存在于男性的自言自语中；既表达愤怒的情绪，也出现在平静的对话中，仅仅作为口头禅而存在。

酒精与脏话一样，是无明确指向性的建构男性气质的方式。布考斯基被译介到中国之后，曾被称为“酒鬼诗人”，而作者的这种对酒精的沉迷也在他的作品中有诸多体现。《苦水音乐》中塑造了总是醉醺醺的男主人公群像，他们借沉迷于酒精来逃避现实生活中的窘境。在小说集中，甚至不乏直接以与酒有关的名字命名的故事，例如《在街角酒吧喝啤酒》、《好一场宿醉》、《长途酒醉》。酒精可以把这些底层男性从他们的现实处境中暂时地隔离起来，廉价的啤酒和威士忌与他们口中的脏话一样，是无法实现理想中的男性气质时而移情的一种方式。对于底层男性而言，这种无法实现理想的男性气质而利用脏话和酒精塑造一种伪理想状态，正是他们的男性气质本身最突出的特点。

1. 结语

布考斯基在《苦水音乐》中的男性只有完全走出父权在经济和社会身份上的控制，才能获得建构理想的男性气质的前提。因为女性是相对于男性的他者，与女性的对立与同一关系使得“男性气质”成为“独立个体的气质”与“相对于女性而言的男性的气质”的混合体。由于布考斯基笔下的主人公除男性之外只有女性（无跨性别者），想要形成独特的男性气质，那么与女性之间建构出某种关系成为他们塑造男性气质的必经之路。在布考斯基的笔下，这种关系就是上文提及的既对立又同一的。同时，《苦水音乐》中的男性以说脏话和酒精的方式转移他们无法建构理想中的男性气质的苦闷，说脏话一方面是对他人施加的语言暴力，另一方面，也是他们为凸显男性气质而做的尝试。

布考斯基通过对美国底层男性的气质进行着力描绘，一方面是对自身境遇的嗟叹，另一方面，也正是作品之所以闪烁着人性关怀的原因，即对人类生存意义的思考。

布考斯基的作品和访谈中都曾多次提及法国存在主义文学大师加缪，尤其是在他的短篇故事《被烧到就要尖叫》中，他提及了加缪的作品《抵抗，反叛与死亡》，以男子亨利的视角阐述了加缪在这部作品中的思想，而且布考斯基还借以亨利的身份对加缪发表了看法：“一个聪明人，但亨利比较喜欢被烧到时会尖叫。”在故事《冷夜》中，他提及加缪时如是说道“是谁写了一篇很棒的断头台文章？加缪？加缪，对。加缪也是个脓包。但是断头台那篇文章与《局外人》不算。”从布考斯基对加缪的几次评述来看，他崇尚勇敢地面对生活的真相并对生活中的阴暗面给予自然真实的反应，即“被烧到时就要尖叫”。具体到布考斯基的作品中，当面对底层生活的压力时，男性们的反应都是真实自然的。这种真实自然以酗酒和性暴力等消极方式表现出来，即男性们并不为逃离底层生活而做任何积极的努力，不作任何反抗，仅仅从生理层面上麻醉自己。

另一方面，布考斯基笔下的男性气质中美好的一面也体现在“被烧到时就要尖叫”。也就是说，他们之所以对生活持一种消极抵抗的态度，是因为他们有意思或无意识地看透了底层生活的本质。《苦水音乐》中的男主人公有的颇具文学才华，有的按部就班地工作，有的对爱人充满着脉脉温情，他们虽然都无法实现理想中的男性气质，但对于底层生活都持有超脱的洞见。甚至那些行为不堪的男主人公，也都对生活抱持一种古怪的清醒态度。

布考斯基笔下的主人公切那斯基的一句话，可以集中表现出《苦水音乐》中一种与男权社会传统性别观念有所区别的观念，即“没有任何男人，能把女人当成自己的。我么永远无法拥有她们，我们只能借用她们一会儿。”《苦水音乐》中的女性象传统男权社会一样是被物化的，被“拥有”的，但不同的是，她们已经拥有了自己的独立的意志，可以自主决定自己的行为，因此只能被“借用一会儿”。这也正是《苦水音乐》中的男性气质较为先进的一面，故事中的社会底层男性已经充分认识到了女性的自主权。

参考文献：

1. 苦水音乐 查尔斯-布考斯基 著 巫土 译 杨敬 校译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7
2. 上帝之肋：一部男人的文化史 [罗伯特·布莱](https://www.amazon.cn/s/ref=dp_byline_sr_book_1?ie=UTF8&field-author=ç½ä¼¯ç¹Â·å¸è±+(Robert+Bly)&search-alias=books) 著, [田国力](https://www.amazon.cn/s/ref=dp_byline_sr_book_2?ie=UTF8&field-author=ç°å½å&search-alias=books) [卢文戈](https://www.amazon.cn/s/ref=dp_byline_sr_book_3?ie=UTF8&field-author=å¢ææ&search-alias=books) 译 重庆：重庆出版社 2013.6
3. 社会性别——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中心概念 刘霓 著 国外社会科学2001年06期
4. 性政治 凯特-米利特 著 宋文伟 译 著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0年3月